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光主编

浙东学术史话

钱茂伟 著



宁波出版社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之三

浙东学术史话

钱茂伟 著

宁波出版社

本册著者:钱茂伟

责任编辑:马玉娟

封面设计:陈 罡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

吴 光 主编

* * * * *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 邮编:315000

余杭大陆友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5 插页:24 字数:765千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套

ISBN 7-80602-342-9/K·26

定价:全套60.00元 本册8.00元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书目

书 名	著 者
河姆渡文化史话	季学原 诸焕灿
良渚文化史话	陈白夜
浙东学术史话	钱茂伟
浙江戏曲史话	徐宏图
浙江佛寺史话	陈荣富
浙江丝绸文化史话	袁宣萍
浙江茶文化史话	陈 琿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编委会

顾 问：毛昭晰 龚鹏程 魏 桥

主 编：吴 光

编委会委员：

吴 光 马玉娟 季学原 徐 斌 陈剩勇
屠承先 钱黎明 徐建春 林日葵 刘 鹤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吴 光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至少七千年的繁衍生息征途上，我们的先民凭靠其聪明睿智与勤劳勇敢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浙东文化”等等名闻遐迩的文化典型，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从而使浙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无愧于“文物之邦”、“文献名邦”的高雅称号。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四千万聪明勤劳的浙江人民，正在继往开来地建设一个经济上繁荣开放、文化上多元发展的文明新邦。

处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作为知识界、文化界的成员，我们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去整理和总结浙江七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原貌与经验，并以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我们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从而为浙江现代化与现代浙江人提供一份可资了解历史、开创未来的资

料,这便是本人和本书编委会诸同仁发愿编纂《浙江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根本动机。

然而,“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浙江文明源远流长、绚丽多姿,其史料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总结其历史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更非一人一伙所能竟功。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个并无官方拨款而靠民间赞助的学术研究团体,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上皆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志大而“财”疏,因此只能量力而行,做一些力所能及而又稍具特色的文化研究工作。于是,我们选择了浙江文明史上最具有光彩、最具特色的几个侧面与门类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因此,首先集中精力编纂了这套《浙江文化史话丛书》。今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希望能够组织深入研究浙江文化史的专著丛书。例如《浙江文化名家丛书》、《浙江历代思想家丛书》等等。

本丛书是由本主编组织策划、并与各位顾问、编委反复协商后确定专题、再约请各专题所涉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撰著的。其特色在于,它选择了浙江区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历史题材为研究对象、以史话为写作体裁、将若干种各自独立成书的小型学术著作合编为一部综合性的区域文化丛书,从而构成熔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的系列历史知识读物。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总体反映从史前河姆渡文化到清代姚江文化变迁史的《河姆渡

文化史话》，有生动描述人类玉器时代辉煌业迹的《良渚文化史话》，有系统记载浙东学术发展脉络与评述浙东优良学风的《浙东学术史话》，有全面反映浙江地方戏曲之起源、发展、演变状况的《浙江戏曲史话》，有结合实地考察、描述浙江佛教建筑特色和浙江佛教发展演变历史的《浙江佛寺史话》，还有经过专业梳理提炼而生动反映浙江物产特色及其文化内涵的《浙江丝绸文化史话》与《浙江茶文化史话》。

收入本丛书各部著作，经过各位著者的精心撰著和编者的细心审改，基本达到了“语言流畅、品位精美；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要求。著者力求避免泛泛介绍、平铺直叙和史料堆积，而以散文笔调写历史，既写出了所涉主题的发展演变脉络和历史作用，又写出了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及其蕴涵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尽管各册专著在写作风格与技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不齐、文采有别的问题，然而我敢断言：本丛书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并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

本丛书在课题策划和组稿过程中，得到了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浙江大学毛昭晰教授以及著名地方志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魏桥编审等专家学者对研究课题的积极支持，并受到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支持。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还得到了台湾南华管理大学及龚鹏程校长、浙江

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陈文宪总经理、浙江金义集团及陈金义总裁等单位和个人对本研究课题的部分资助。尽管资助的数量有限,但他们支持学术文化研究而不求回报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和各位作者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让我们再接再厉、携手共进,为正确认识、深入发掘、发扬光大我们浙江七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优秀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文化优势,为在新世纪开创浙江文化发展的新局面而贡献心力吧!

(1998年10月写于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
1999年6月改定于朝晖寓所)

目 录

《浙江文化史话丛书》总序

- 导论：“浙东学术”的定位、精神与学风 (1)
- 一 从学术中心区的递变看浙东学术的演变轨迹
1. 汉唐时期：会稽地区一花独放 (11)
 2. 宋元时期：明州、温州、婺州三大学术中心区依次
兴盛 (14)
 3. 明清时期：宁绍地区再度强盛 (19)
- 二 汉唐浙东学术撷谈
1. 王充的学说与学风——浙东学术精神的发轫 (20)
 2. 《越绝书》、《吴越春秋》——浙东文献的源头 (25)
 3. 虞世南《帝王略论》——唐初浙东史学的骄傲 (27)
 4. 天台宗的兴起——浙东佛教中的创新精神 (28)
- 三 浙东事功学——浙东学派独立亮相
1. 吕祖谦与朱熹的学术风格异同论 (32)
 2. 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辨 (35)
 3. 永嘉学派对理学的批判 (38)
- 四 浙东心学——中国心学的大本营
1. 慈湖心学：陆学与王学的桥梁 (46)
 2. 王学：风靡晚明的心学 (50)
 3. 浙东的阳明后学：王学的后院 (55)
- 五 浙东朱学——程朱理学在浙东的异化

1. 兼朱学与吕学于一体的金华朱学	(59)
2. 务明体以达用的四明朱学	(65)
六 浙东文献考据学——中国朴学的源头活水	
1. 朴学鼻祖王应麟	(74)
2. 博洽学人胡应麟	(78)
3. “一代文献宗师”全祖望	(82)
七 “国可亡,史不可亡”——浙东学者修国史	
1. 宋濂、王祜主修《元史》	(87)
2. 张岱逆境订《石匱书》	(90)
3. 万斯同“隐忍史局二十年”	(94)
八 “传先贤之精蕴”——浙东的乡土文献传统	
1. “方志之乡”首浙东	(98)
2. “更增贤哲,光我枌榆”	(103)
九 浙东的学术世家——从家族文化看浙东学术传统	
1. 风光八朝的余姚虞氏	(109)
2. 名冠海内的余姚黄氏	(111)
3. 代出俊贤的甬上万氏	(114)
十 清代浙东学派——为清代学术史增光添辉的一章	
1. 大旗下的三个支派	(119)
2. 维系学脉的“家法”	(125)
3. 领学术风骚的浙东人	(128)
十一 晚清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的文献考据学	
1. 定海黄式三、黄以周	(135)
2. 甬上徐时栋、董沛	(139)
3. 绍兴李慈铭、平步青	(140)
4. 温州孙诒让	(144)
十二 浙东学术在海内外的辐射	
1. 浙东学术在国内的影响	(147)
2. 浙东学术对国外的影响	(150)

导论：浙东学术的定位、精神与学风

(一)

浙东,按照今人的习惯说法,自然是指浙江的东部地区。但在历史上,它的含义却复杂得很,有“大浙东”、“中浙东”、“小浙东”之分。“大浙东”是指钱塘江以东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宁、绍、舟、台、温、丽、金、衢八个地区。这个称呼的来历,和江南的自然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今天的“小江南”(指浙江、上海、苏南),春秋战国时期为吴、越两国地盘。秦统一江南后,习惯上仍称吴越地区。吴越地区中间隔了一条钱塘江(也称浙江),明显地分为东西两大块。在没有桥的年代里,大江大河是一道天然的分隔线,故东汉以来,习惯分治。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以“浙江之北”为吴郡,以浙江之南为会稽郡。唐朝在吴越地区设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宋朝时改称浙东路、浙西路,于是有“浙东”、“浙西”称呼。清代的章学诚写《浙东学术》,有“浙东之学”、“浙西之学”一说,用的正是“大浙东”、“大浙西”含义。否则,以苏南人顾炎武为浙西之学的开山祖便不可理解。清代雍正《浙江通志》,以“上八府”为浙东,“下三府”为浙西。

这里的“浙东”仍是“大浙东”，而“浙西”则已成“小浙西”。“浙东”在明清时期主要是指“中浙东”，也即宁绍地区。今人所用“浙东”，则已是“小浙东”，也即宁波地区。今人曹屯裕主编的《浙东文化概论》，用的正是“小浙东”含义。

不管“小浙东”、“中浙东”，抑或“大浙东”，放眼中国来说，这始终是一块弹丸之地，是一块“天涯海角”。沿海地区，在今天是一块不断发生奇迹、最有活力的地方，而在古代世界，它却是一块“化外之地”。传统中华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根是以河川、平原为主体的大地，高山、高原和大海，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太感趣的地方。用西方大哲人黑格尔的话说：“在他们（指中国人）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中国文化的中心一直在内陆中心地带。站在历代首都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看江南的“浙东”，简直是放不到眼皮底下。

浙东是一块不起眼的小地方，然而浙东籍学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却是非常了不起的。“浙东学术”之所以值得瞩目，首先在于它出了许多一流的学人。自东汉以来，浙东出了不少全国知名的、走在时代最前沿的一流学人，如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章学诚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南宋开始，越在全中国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常常处于领先地位。从理学到心学，到民主启蒙思想，到研究西学，到介绍马克思主义，越都有杰出代表。”（裘克安《越文化的召唤》，见《论浙东学术》）

特别是它出了全国一流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是中国最有名的、地域性的学术流派。30年代的何炳松说：“著者的愚见以为在我国学术史上要以浙东学派为最有光彩。”（《浙东学派溯源》页188）浙东学派，不仅仅是浙东地方的，它也是中国的，按照现在时髦的企业命名法，它的前面应冠

以“中国”二字，称“中国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是中国学术的精华，“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浙东学派溯源·自序》）

（二）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都曾出过大学者。浙东是一个区域概念，以区域命名一种学术，称“浙东学术”，是不是妥切？有人或许会这么问。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浙东学术”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前后有着大体相似的、一脉相承的治学风格与精神。“浙东学术”是以“浙东学派”为主干而形成的一种区域性学术体系。

章学诚《浙东学术》是第一篇专论浙东学术精神的文章。章氏在文中将浙东学术精神归纳为反对门户之见、贵专家之学、学术要经世致用三条。这个说法，至今看来仍是十分精辟的。80年代以来，浙江学术界诸先生又从不同角度对浙东学术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概括，这使我们对浙东学术的精神、风格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大体说来，浙东学术有着以下几大精神：

经世。知识分子治学，要不要与现实社会政治挂钩？是抱入世态度抑或出世态度？是追求纯学问抑或学以致用？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浙东学人的态度十分鲜明，主张经世致用，反对为学问而学问。他们这种精神，来源于他们所持的“真儒”观。何谓儒？黄宗羲曰：“儒者，经纬天地。”换言之，只有学术与“经济”（经邦济世之学）兼通的知识分子，方可配称儒。治学以讲世务为己任，在清代浙东学派诸人身上表现最为突出。黄宗羲明确认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南雷文案·今水经序》）。黄氏

弟子万斯同说：“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石园文集》卷7《与从子万贞一书》）。所谓经世之学，就是“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其始末，斟酌其确当者，定为一代之规模”（同上），也即社会政治、治国之道。由于时代的不同，浙东学人经世的方式是不同的。“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务实。从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论出发，浙东学人在治学内容上表现出务实的特点，反对空头理论，崇尚历史研究。南宋浙东学派以尚实学知名，故有浙东事功学之称。元明时期，浙东学术的主流精神是尚虚，浙东心学是中国心学的大本营。但即使是这样，仍有不少人讲实学。到了清代，浙东学术又开始崇尚实学。他们认为朱陆“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而史则“切于人事”，比较贴近社会，有实用价值。黄宗羲有一句名言：“学必原本于经术而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鲒埼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章学诚后来在和别人的辩论中，屡屡说到“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要求撇开空泛的天人性命之学，进行踏实的经史研究，正是浙东学术的优良传统。

救偏。浙东学人的经世精神，除表现在直接以讲世务为首任外，还表现为以学术经世，在学术界常以批判旧学风、开创新学风面目出现。他们认为“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同上，《原学下》）。意思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风气，学术风气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学

人,关键的是能“持风气”,而不是“徇风气”。也即做一个顶风之人,不要做随风、鼓风之人。章学诚称“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同上)。黄宗羲也有类似主张,称“哲人代兴,因时补救,视其已甚者而为之一变”(《宋元学案》卷86《东发学案》)。不唯时代潮流,敢和旧的权威学术作斗争,此确为浙东学人的一大特点。早在东汉,当神学化儒学充斥于世时,王充就敢站出来作斗争,提倡唯物论、无神论哲学。在南宋,当程朱理学盛极一时时,浙东学人陈亮、叶适公然站出来,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在明代,当程朱理学教条化之日,王阳明敢倡心学。在清初,当王学趋于末日时,黄宗羲倡经史典籍研究,开创了清代浙东学派。当乾嘉时期考据学全盛时,章学诚又站出来,大声疾呼学术经世,提倡理论性宏观研究,反对以训诂考核求道,成为中国旧史学的殿军。我们可以说,浙东学人是一批敢领时代风骚的先进学人。

兼容。黄宗羲的基本学术观是“一本而万殊”论。一本是指儒家的圣人之道,万殊是指学人们对圣人之道的多种体认。这个命题,用今天的真理观来说,一本是绝对真理,万殊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只有一个,而相对真理则可有多个。“一本而万殊”的具体原则是一本散于万殊,万殊总归一致。只要工夫著到,那么,“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南雷文定三集》卷2《钱启忠墓志铭》),相对真理是能够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的。根据这个真理观,黄宗羲得出了三点认识:第一,学术不可独尊。他认为“盖道,非一家之私”(同上),每一个学人都可以去探索、体认。“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明儒学案·自序》)。黄宗羲进一步打比方说,“道犹海也”,各种江河则是真理认识之途。江河本身是一泓水,各不相同,但一旦注入大海,则变成相

同的海水了，可谓殊途同归。可惜，这个道理，很多人搞不懂，“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明儒学案·序》）。第二，学术不可无宗主，又不能有门户之争。按一本万殊论，各种不同的学术，都是认识真理之一途，自然，各派间应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不能有门户之争。“夫门户之病，最足痼人”（《宋元学案》卷86）。章学诚则直接了当地称“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第三，主张博采。宋元明清时代，朱学与陆学、宋学与汉学之争十分激烈，浙东学人却能超然于门户之争，主张兼容并蓄，确难能可贵。浙东学人的兼容并蓄精神，在历代浙东学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吕祖谦、王应麟汉宋兼取，黄震、宋濂、黄润玉、杨守陈、黄宗羲、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等朱陆兼取，徐时栋、袁钧、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汉宋兼取，都是兼容的表现。即便到了本世纪初，浙东学人仍有此精神，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允许新旧学说同时在“北大”并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北大”学人能时时领中国学界之先，蔡元培功不可没。

求真。在如何继承传统学术、老师学说问题上，许多人以为原封不动地承袭才是继承，否则是离经背道。浙东学人的观念则正相反，认为墨守是形式上的继承，只有不苟同、求自得、志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他们的口号是博考、深思、求是。他们从“人心各有不同”观念出发，强调独立思考，“但求其是而已”。黄宗羲认为，师授与自得，两者缺一不可，“无师授者，则有多歧亡羊之叹；非自得者，则有买椟还珠之诮”（《宋元学案》卷86《东发学案》）。黄宗羲尤其推崇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

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明儒学案·凡例》）。全祖望对浙东学术中的这种求真精神理解得很透。他称四明朱学三大家（史蒙卿、黄震、黄润玉）能“宗朱而不尽合于朱”，堪称朱子功臣。称明代的杨守陈“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鮑埼亭集外编》卷16《城北镜川书院记》）。他自言：“愚生平治经不敢专主一家之说，以启口舌之争，但求其是而已。”“吾尝笑近世之自署为朱学者，迂疏陈腐，但欲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以是为弗畔，锢其神明，塞其知觉，而朱学反自此而晦。”

总之，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是浙东学术中的主要精神。浙东之所以代代出学术风流人物，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氛围有密切关系。

（三）

浙东小小的一个地方为何会出许多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派？为何浙东学人能经常走在时代最前沿？这确是个值得后人思考的现象。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搞清浙东学术产生的物质基础，首先得分析浙东社会的特点。

浙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以平原、山地、海岸为主。在以内陆为中心的时代里，它是一块边缘地带。相应地，它的文化是一种边缘性文化。内陆中心区是儒家文化的天下，而在边缘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则明显减弱。其次，由于地形的复杂，多山近海，浙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农业没有占压倒一切地位，商品经济在这里仍占很大比重。因此，传统的重农抑商意识在这里的市场不